

儒藏论丛



儒藏

阴阳五行研究

(全二册)

先秦篇

彭华◆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全2册 / 彭华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9

(儒藏论丛)

ISBN 978-7-206-08114-9

I. ①阴… II. ①彭… III. ①阴阳五行说—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B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2101号

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全2册

著 者:彭 华

责任编辑:崔剑昆 封面设计: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吉林省显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8.75 字 数:487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8114-9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四川大学“985三期区域历史与
民族研究创新基地”系列成果
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儒藏》论丛
四川省重点基地儒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丛书

编委会

主 编：舒大刚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刁忠民	王小红	王智勇	王蓉贵	尹 波
李文泽	李冬梅	向以鲜	吴洪泽	杨世文
张尚英	郭 齐	黄锦君	舒大刚	彭 华

百年学府，千载诗书

——《儒藏》论丛序

编委会

四川大学是坐落在祖国大西南的一所高等学府，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重点大学，她植根于巴蜀大地，熔铸儒学精神、巴蜀文化与近代西学于一炉。近代“蜀学”是晚清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四川大学又是“蜀学”的策源地和学术中心，回顾四川大学的学术发展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整个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因此研究和总结川大儒学源流，对完整地探索中国儒学史也不无裨益。

川大作为一所现代新型高校，迄今虽然只有110余年历史；但是作为一所具有丰厚文化底蕴、悠久办学历史的巴蜀第一学府，川大的文脉和学统，又可以追溯至清康熙年间所建锦江书院（1704—1903）、光绪年间所建尊经书院（1875—1902）和晚清民国兴办的存古学堂（“国专”，1910—1927）。如果要追述其儒学教育、经学研究的传统，其远源更需从2100年前西汉的文翁石室说起。

“文翁石室”为西汉景帝末年（约公元前143）蜀守文翁所创，它一直是成都地区最高学府，为“蜀学”人才培养摇篮。文翁起学官于成都市中，遣张叔等18人东诣博士，传授“七经”，还教吏民，移风易俗，推行儒化，使巴蜀士人智慧大启，逐渐形成蜚声学林的“蜀学”流派。巴蜀大地，浸浸文学之美；史家褒曰：“蜀学比于齐鲁。”司马相如、严遵、王褒、扬雄等一大批文人哲士，接

踵而起。班固所谓：蜀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书·地理志》）文翁兴学，是古代中国地方政府办学的创举，汉武帝将文翁经验向全国推广，天下乃以郡县学的形式来传播儒学，从而开启了中国地方儒学教育的新篇章，大大促进了儒学在全国各地的传播。东汉末年，蜀守高颐在石室旁修建周公礼殿，图绘周公以下历代圣贤、孔门弟子，以及蜀中先哲，以供祭祀和敬仰，形成“庙学一体”制度，为中国后世学校和书院所继承。

两晋南北朝，玄学靡靡，而史学独盛，蜀之陈寿（著《三国志》）、晋之常璩（著《华阳国志》），俱入中华史家之林。唐诗发煌，雅称蜀士，子昂、太白，称雄其间。而鼎祚沉潜，独撰《周易集解》，“易学在蜀”之称，远于宋世而有闻矣。五代时期，后蜀刊刻石经于石室，碑逾千数，规模宏大，儒家《十三经》经典体系于此正式形成。石室、礼殿、石经，遂成为蜀学三大珍宝，见称于时人。宋吕陶《经史阁记》有云：“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成都文类》卷一四）正谓此也。

宋代蜀学达到极盛，文化世家联翩而出，北宋有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潼山“三苏”（苏易简、苏舜钦、苏舜元）、阆中“四陈”（陈省华、陈尧佐、陈尧叟、陈尧咨），南宋有绵州“二张”（张浚、张栻）、陵阳“四李”（李舜臣、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丹稜“三李”（李焘、李壁、李埴），尤善文史。中经宋末战乱、元代式微，至明朝蜀学又得以复兴，升庵富于著述，独为有明一代之巨擘。

明季战乱，文翁“石室”焚毁殆尽。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奉旨在文翁石室遗址上改建锦江书院，蜀学于焉再起。锦江书院是“文翁石室”的延续，终清一代，一直是四川省城的最高学府。光绪二十八年（1902），锦江、尊经两书院合并成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今四川大学前身），锦江书院独立存在了

200年。锦江书院在教学上主张“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成就斐然，教绩突出，彭端淑、李调元等著名学者，都曾经学习、执教于此。

尊经书院系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兴办，在维持了28年的独立运行后，并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尊经书院不教“八股文”，而以“通经学古课蜀士”，旨在培养“通博致用之才”，并以“绍先哲，起蜀学”勉励士子。在教学途径上，张之洞以纪（昀）、阮（元）“两文达之学”（即“考据学”和“文献学”）相号召，力倡“自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自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自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自经学史学兼辞章者其辞章有用”的治学路径，巴蜀士林，笃实厚重的小学、经学、史学、词章之学一时大盛。嗣后王闿运两次入蜀，前后执讲席者七八年，表彰今文经学，提倡学问思辨，于是蜀士欣欣向学，风气为之大开。尊经书院教学特别注重专经训练，学生可以自由思考，自行研究，自出心得。故尊经书院培养的人才既能“阐述经学微言大义”，又有“崇本达用之方”，成就远大，人才辈出。经学大师廖平，撰《今古学考》，严分今文、古文，从乾嘉诸老醉心的“许郑之学”，推而进于西汉“今古文学”；改良思想家宋育仁，倡言“复古改制”，以经学宣扬革命，吹响维新变法的重要号角。余如蜀学大师吴之英，辛亥革命元老张澜、吴玉章，文献学家张森楷、伍非百，科举状元骆成驥等，皆出自尊经书院，俱为一时豪杰！尊经书院为代表的晚清“蜀学”，以复古求解放，大胆拓展经学内涵，扩大儒学研究范围，开启了中国近代“注重礼制”“明辨今古”的新经学局面。特别是廖季平等人宣扬“托古改制”，驯致疑经惑传，以经学讲革命，求改良，对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维新变法和社会改良，都有积极影响。

1902年，由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中西学堂合办而成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保持了书院时期的学术力量和学科优势，师资多具

有科举功名，向学生传授经学、政法、文学、商科等学科知识，当时高等学堂实为“宿儒”荟萃之所。

历史上川大经学的另一重镇，是与高等学堂并行发展的存古学堂（后改称国学院、国专）。该学堂于宣统二年（1910）设于成都，当时由蜀学才子谢无量担任首任督监（校长）；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2月改称四川国学馆。同年6月，四川军政府咨询机构枢密院改国学院，吴之英任院正（长）。11月，国学馆与国学院合并，吴之英任院正，谢无量、刘师培任院副；原国学馆教科部改称国学学校，隶属国学院，刘师培任院副兼校长。1914年3月，国学院结束，专办国学学校，廖平任校长；1918年，正式定名“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国专”）。

存古学堂（“国专”）独立运行达17年。著名学者宋育仁、廖季平、骆成驥、蔡锡保都曾先后担任校长，其教员大都是当时的“蜀学宿儒”。其教学以经学教育为本，以保存国粹为务，注重专经研习；为培养学生的研究才能，特意开出系列课题，让学生作业。生员们人守一经，犹如汉之博士弟子；且又触类旁通，兼及子史医书。“国专”培养的学生率多出类拔萃，诸如文史大家郭沫若，经史学家蒙文通、李源澄，音乐家王光祈，科学家周太玄，文学家李劫人，异端奇才吴虞等著名人物，等等。存古学堂又移入锦江、尊经两书院书版五六万片，组建存古书局，前后付梓达300余种，一时成为成都重要的出版机构。“国专”还主办《四川国学杂志》（后改名《国学荟编》）、《国学月刊》，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国学研究专刊。

20世纪初期的巴蜀学人，在国学式微的状况下，心怀国家兴亡、文化衰替的忧思，顽强地宣传国学、保持国粹。特别是四川存古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普遍停办的情况下，还更换校名继续办学达17年，遥与无锡国专（1920年创办）、清华国学院（1925年创办）相呼应，研经习典，为国学的保存和研究，特别是日后川大

的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专业的开办，培养和储备了雄厚的师资，真是功莫大焉！“国专”（1910—1927）的系科有经学门、史学门、词章门三门，经学是其基础和核心；宋育仁任校长时期（1918）改为哲学科、史学科、国文科，哲学科主体仍然是传统儒学。

1927年，“国专”等五所专门学校合并为公立四川大学，“国专”为中国文学院，分设国文科、哲学科。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与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归一”，组建国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改称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史学系、教育学系，经学教育分散于文学系、历史系中。文学院继承了存古学堂（“国专”）的师资和传统，继续传授儒学知识。当时文学院院长是文史名家向楚，教务主任是经史大家蒙文通，教员则有龚道耕、林思进、朱青长、余舒、赵少咸、李思纯、刘咸炘、唐倜风、伍非百等大批硕儒，教育实力雄厚，学术成果丰硕。

进入20世纪后半期，川大与全国其他高校一样，儒学教育与经学研究也处于停顿状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1955年至世纪末，50年间发表儒学方面论文仅八十余篇，其中一半以上是“批孔”“批儒”之作，真正学术论文每年不到一篇。这是一个儒学与经学被丑诋和遗忘的时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具有深厚经学传统、国学底蕴的巴蜀学人，对儒学的热忱，总会随着世运的转换而应机表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后，川大“长在文史”的优势迅速得到发挥，涌现出一批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历时10年、凝聚四百余名专家学者心血的、收字最多的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于1990年顺利出版；《全宋文》等大型项目，相继获得国家立项；大批儒学和国学研究作品陆续问世，这些都预示着儒学研究春回大地和蜀学传统的当代复苏。

川大学人还十分注意儒学文献的整理研究，这集中体现在古籍所近年的工作上。该所始建于1983年，当时学术带头人是著名学

者徐中舒、缪钊和杨明照等；胡昭曦、赵振铎、曾枣庄、刘琳、王晓波、李文泽和舒大刚等先后担任所长、副所长。综观本所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宋代文献整理和研究阶段。本所首先着力于宋代文献整理和研究，先后承担上亿字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全宋文》，1200万字的国家重点工程《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宋集珍本丛刊》（108册），还出版有《朱熹集》（10册）、《三苏全书》（20册）、《宋人年谱丛刊》（10册）、《宋代文化研究丛书》（1—7种）等系列成果，在川大形成了宋代文化研究基地，为以后向儒学研究领域的纵深发展储蓄了力量！

二是儒学文献整理和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古籍所又将儒学文献研究提上日程，主要工作有文献整理、专题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在文献整理上：1997年，启动“儒学文献调查和《中华儒藏》编纂”工程，并申请了“儒藏”商标注册。1999年，《儒藏》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4年，又列入“国家985工程”创新基地建设项目，同年又申请批准为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目前《儒藏》已经出版“史部”248册，学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改写了儒学自古无藏的历史”。

川大《儒藏》重在儒学文献的全面调查研究和著录整理，参考《佛藏》“经、律、论”，《道藏》“三洞四辅”的分类方法，以“三藏二十四目”著录儒学文献。《儒藏》将儒家文献分成“经”“论”“史”三大《藏》，以下又根据文献类型细分若干子目，按主题收书，分别构成各种专题丛书。《儒藏》吸收《别录》《七略》《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验，采用分类编排、系统著录、精心校点、提要评说等方式，全书还撰有“总序”，各类再冠以“小序”，从而完成了对儒学文献的历史研究、源流探索和著录体系构建。

在专题研究上：为推动儒学研究，配合《儒藏》编纂，川大有计划地组织儒学流派、儒学文献等专题研究，出版“儒藏学术丛书”，编辑论文集《儒藏论坛》。

在儒学流派研究方面，我们继承“学案体”的编纂方法，撰著并整理了历代儒学学案10种，约一千七百万字，从而构成了反映2500年儒学流派传承关系的《中国儒学通案》，其中“清儒”10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儒学文献研究方面，川大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儒家文献学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对历代儒学各类文献进行了全面普查，编制了“专经”（或“专类”）目录，进行专题研究，分类概述，写成《儒学文献通论》和《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史》两部书稿。

此外，川大还主办“儒藏讲座”“儒藏网站”，以多种方式宣传儒学及其思想；启动“20世纪儒学大师文库”，汇录和总结近百年儒学研究成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编纂，加强“蜀学”成果的汇集和整理。

在学科建设上：近年来，川大加强了相关学科的建设，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中国儒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7年申报成为国家“历史文献学”重点学科。为整合儒学研究力量，恢复川大儒学传统，2009年，川大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支持下，联合组建了“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这些都是百余年来川大学人孜孜耕耘于古籍文献整理、儒学与经学研究领域的结果，也是两千余年来“蜀学”发展的逻辑演进，为未来的儒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

在人才培养上：从1999年始，川大“历史文献学”下设有“儒学文献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始，在专门史下设有“中国经学史”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目前又在历史学科下增设“中国儒学”二级学位点，招收“儒学历史”“儒学文献”“儒

学思想”“儒学与现代社会”“海外儒学与儒教”等专业的研究生，在儒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获得了系统规划和长期发展的空间。目前该专业有博士生导师5人，已招收和培养了三十余位硕士、博士研究生。

目前，在文献整理和儒学研究方面，川大已完成新老交替和学科转型，一方面，诸位前辈虽从前台退下，但仍退而不休，还以不同方式参与本所、本院的科研活动和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在岗的诸位学术骨干，多功力醇厚，年轻学人亦茁壮成长，形成老、中、青配合的良性互动格局。随着《儒藏》编纂的持续进行和国际儒学院的成功组建，川大儒学研究的力量再次得到整合和转型，儒学教育与经学研究的传统迅速得到恢复。同时，四川大学历史上以“专经”教育来培养儒学人才的模式，也在今天得到继承和弘扬，并取得初步成效，一批优质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已顺利完成，获得学界同仁的认可。

新组建的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系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四川大学三家联合共建，其专兼职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全国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还有美国、欧洲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和儒学研究人士。为及时反映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状况，我们拟在编纂出版大型丛书《儒藏》之外，组织出版一套研究型著作——“《儒藏》论丛”。论丛第一辑十二种，其中8种系四川大学近年培养儒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论文和报告，另有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各一种，在本院兼职研究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西华师范大学教授的著作各一种。今将这些成果汇集起来，一并予以出版，以交流于学界，并求正于方家。

总之，四川大学在历史上曾经是一所具有悠久儒学教育和经学研究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前辈学人，在儒学人才培养、儒家经学研

究方面曾做出过非常突出的贡献。今日之川大学人，成长于兹，寝馈于此，自当绍先贤，起蜀学，以《儒藏》编纂为契机，在儒学教育、经学研究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继承弘扬川大的优良传统，不懈努力，勤奋治学，为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伟大复兴，聊奉绵薄！亦愿学界同仁，多多帮助和指正。

是为序。

2010年10月

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序

谢维扬

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辉煌的成就，这是所有人都不能否认的。而在这些成就中，有一项是应特别提到的，那就是中国古代形上学的发展。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即使是最原始的民族也有进行形上的思维的需要。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因为无论是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上，人类都会遇到大量以经验知识所不能解答，而又以追问万物与人生的终极目的及价值为内容的问题要回答，这时唯有“形上”的思维是最能填补经验方法的不足而满足人们认知和精神上的需求的。古代中国也是如此。但是古代中国形上思维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形式却是独特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①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当时不可能知道孔子同《周易》的关系。而他在评论《周易》时，就毫不含糊地称赞《周易》里面有“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把《周易》说成是古代中国“达到纯粹思想意识”的证明。^②这说明，黑格尔看出了中国古代形上学的一种非常高级的形态是在《周易》的形式里面发展出来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也非常深刻，是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构成的一种很准确的理解（如果黑格尔了解我们现在对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0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0页。

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认识，他恐怕会修正对孔子的上述评论）。

而说到中国古代的形上学，我们就一定会提到支撑古代中国形上学的两个最重要的基本的范畴，即阴阳和五行。“阴阳”两字在《易经》本文中并没有出现，而且两字的字源意义也都来自对经验事实的描述，但作为一种哲学的范畴，或者作为古代筮占术运算的基本工具，阴阳概念却是高度抽象的，并构成《周易》形上学体系运作的基础，这一点从对《周易》筮占形式构造逻辑的体会中是可以确认的。五行，则是从与阴阳不同的认知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另一组构造古代中国形上思考基础的抽象概念，并且也成为这个形上学体系的基本范畴。从这里可以看出，研究阴阳五行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和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的形上学，而中国古代形上学则是引领整个古代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灵魂。本书引述前人的意见指出阴阳和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文化的骨架”^①，这些说法都并不夸大，因为正是阴阳五行这对范畴支撑了古代中国形上学的框架和逻辑，从而对古代中国的思维和文化都有塑造的作用。

从近代以来，为了更准确地认识传统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内容及特质，许多学者都对阴阳和五行问题做过研究，而这一研究所针对的历史时期非常长，有关的资料极其浩繁而又驳杂。本书在回顾有关学术史时对此有很完整的整理和分析，为我们理解以往阴阳五行研究的得失，为进一步研究清理出一条较为恰当的研究路径有帮助。从某种意义上上说，资料方面的工作是阴阳五行问题研究的最大难点和关键之一。从本书有关章节中的论述可以知道，讨论阴阳五行问题，不仅所涉及的资料种类众多，而且几乎没有一种资料从文献学角度说是不存在问题的。这就需要做许多非常严谨的对于资料的基础性研究。其次，对于概念的准确的运用在这项研究中也十

① 见本书第1、3页。

分重要。虽然阴阳和五行最终都成为中国古代形上学里面的范畴，但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同时在古代文献的整个表现中，它们的意义也并非绝对是绝对和一成不变的。它们都有在低于作为一对古代形上学范畴的意义的水平上发生作用的种种表现，而这些也是阴阳五行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内容的一部分。没有这方面区分的认识，当然也讲不好真正的阴阳五行史。所以这项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是很高的，即不仅对于中国古典学问题要有通盘的掌握，而且要有处理古代哲学和概念问题的很好的能力，甚至对于欧洲古代哲学和逻辑学上的一些问题也需要有一定的了解。本书在上面所说的这两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是阴阳五行研究的一个新的有价值的成果，相信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从本书目录中可以看出，在阴阳、五行这个总题目下，需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非常多。本书对其中大部分问题都做了较为详尽的学术史整理，在许多问题上依据新出现的资料或用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意见和结论对于推进这项研究是有帮助的。其中有些结论似可特别引起关注。例如在阴阳范畴的形成的问题上，作者经分析后认为，“先秦‘阴阳’范畴的形成，老子和孔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如果没有《老子》和《易传》，阴阳就不会上升为一种光辉的哲学思想。”^①这个说法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形上学理论形成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里提到了古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两个事实，一是孔子和老子都在构造较高水平的形上学方面做出过努力；二是中国最早的两大形上学体系在构造上都借助了古代的“阴阳”这对概念。我过去猜测《老子》中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意蕴的来源同《易传》中描述卦画生成过程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有关，

^① 见本书第510页。

也是在推测老子和孔子都以阴阳为工具来构造形上学体系。^① 本书的有关论述会引起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研究证实的兴趣。

在五行的问题上，本书的一些分析也颇有心得。如书中说“‘五行’最初是表‘地’之五种物质，后来才借以表‘天’之五大行星，……再后来，又以‘人’之‘五常’附会‘天’、‘地’之‘五行’；又后来，五行图式日益泛滥，举凡宇宙万物皆可囊括于其中”。^② 这是对于“五行”作为古代有着很早起源的一种普通概念，如何在漫长的变化中一步步形而上学化的过程的一个假说，应该有其参考的价值。今后的研究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所有有关的关系，最终清理出作为形上学范畴的“五行”发生的真实轨迹。这就有更大的意义了。我想本书围绕着这类问题所做的较深入的学术史总结和所提出的新分析与见解，对于推动阴阳五行研究进一步深入进行无疑是有益的。

在对阴阳五行问题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注意到的。那就是阴阳五行不仅是古代中国形上学架构的基本范畴，其本身也始终是整个古代中国更广范围内文化现象的一个要素。前面我们说过，我们应该看到阴阳五行作为古代中国形上学范畴的作用。但是仅仅看到这点还是不全面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生活中，阴阳、五行还同时始终具有真实的经验认识工具的特质。它们在古代是非常广泛而深深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形上学不同于西方本体论形上学的特征，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形上学（由阴阳五行这些范畴来构成其体系）在满足人们超验思考需求的同时也是全面伸入经验层面的认识中的。^③ 本书在结语中曾引述李约瑟

① 参见拙著《至高的哲理——千古奇书〈周易〉》，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6页。

② 见本书第512页。

③ 参见拙著《至高的哲理——千古奇书〈周易〉》，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6页。